

全球史视野下清代中后期徽州茶商的际遇^{〔*〕}

康健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徽州茶商发展历经繁荣——受挫——复兴的曲折际遇。在此期间,国际茶叶贸易格局从绿茶贸易为主逐渐转向以红茶贸易为主,开埠通商更进一步刺激世界市场对华茶的巨大需求,使得徽州茶商发展迎来短暂的繁荣局面。19世纪中叶的国内外复杂局势给徽州茶商带来重大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时代机遇。徽州茶商在夹缝中迎难而上,主动迎合国内外市场需求,创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优质茶叶品牌,努力争取并拓宽世界市场空间,从而迎来新的发展。徽州茶商亦在此时走向复兴,成为引领近代徽商群体发展变迁的核心力量。

〔关键词〕全球史视野;徽州茶商;挑战;机遇;复兴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2.016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的重要转折期。其重要转向有二:一是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由绿茶为主向红茶为主的转向;二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华茶在国际贸易中“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转而面临周遭国家茶叶产品的激烈竞争。中国绿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逐渐被日本绿茶挤占;虽然国际茶市中红茶贸易日趋繁荣,但中国红茶逐渐受到印度、锡兰等英属殖民地所产红茶的强烈冲击。在此国内外局势复杂变化的近百年时间里,徽州茶商发展历经繁荣——受挫——复兴的曲折际遇。

以往学界有关徽州茶商的研究成果虽然颇为丰硕,^{〔1〕}但未能深刻注重从全球视野综合考察徽州茶商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茶叶贸易格局,^{〔2〕}以及徽州茶商如何因时而变,追求创新而走向复兴的背后逻辑,因而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鉴于此,笔者从全球史的视野切入,综合考察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百年国际贸易格局重大变动下徽州茶商的际遇以及应对之策,以期从宏观上深化对近代徽州茶商与茶叶贸易发展的既有认识。

一、繁荣的隐忧:“广州体制”时期徽州茶商贸易之盛衰

17世纪初,荷兰人最早将中国茶叶作为商品输入欧洲,此后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等相继来

作者简介:康健,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茶叶贸易史和徽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徽州茶商研究(1500—1949)”(22BZS160)的阶段性成果。

华采购茶叶,运往欧美销售,从而开启茶叶的全球贸易格局。^[3]荷兰、英国最初来华主要是购买绿茶,但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对华贸易中红茶采购量逐渐增加,在18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绿茶、红茶并重的贸易格局,到18世纪后期,红茶贸易逐渐超过绿茶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茶叶贸易格局中,红茶贸易占据压倒性地位,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明显。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角山荣就注意到,18世纪中期英国进口的茶叶中,红茶占66%,绿茶约占34%，“红茶与绿茶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英国人选择红茶的取向已固定下来”。^[4]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几乎为世界唯一的产茶大国,西方茶叶贸易份额几乎为中国独占。因此,18世纪中叶以后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由绿茶为主向红茶为主的整体转向对中国茶叶出口产生深远影响,刺激徽商积极从事茶叶出口贸易,推动徽茶大量出口。彼时徽商不断将松萝茶、屯溪绿茶运往广州,通过十三行的行商出售给洋商,从而转口到欧美国家。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则从广州大量购买松萝茶、屯溪绿茶。从1742年开始,荷兰对华茶叶贸易中大量采购松萝、屯绿等徽州绿茶。1742年购买松萝茶75710荷磅,占对华茶叶贸易总量的8%。1743年采购松萝茶193041荷磅,占总量的18.3%。^[5]该年为荷兰采购松萝茶数量最多的年份,此后荷兰虽然每年采购松萝茶,但数量逐渐减少,该国在对华茶叶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也不断降低。自1760年至1794年,荷兰每年都从广州采购屯绿,形成了松萝、屯绿并行的徽茶出口局面。1760年,荷兰从广州采购51747荷磅屯绿,1761年采购屯绿28747荷磅。因受到国际茶叶贸易格局转变的影响,1760年以后,荷兰在广州采办的绿茶也逐渐减少。从1760年开始,荷兰每年从广州采购的松萝茶、屯绿仅占茶叶总量的5%~10%,而武夷、工夫、小种、白毫等红茶则占90%以上。^[6]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形成红茶为主、绿茶为辅的对华茶叶贸易结构,但在广州采购的松萝、屯绿也颇多。这主要是因为采购绿茶走私到欧美其他国家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米德尔顿和韦塞尔两人坚持说,“给尼什的训令只包括供应绿茶,连续五个月都反对他的各项订购,只承认松萝茶一项”,那个贸易季购买松萝茶6000担,每担价格在十五六两左右,^[7]可见,当时徽州松萝茶出口英国颇为兴旺。18世纪20年代,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中50%以上是松萝绿茶,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进口到英国的松萝绿茶下降为30%,武夷红茶上升到60%以上。^[8]1778年开始,英国逐渐在广州采购屯溪绿茶。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潘启官、瑛秀、文官、周官、球秀等行商手中采购的松萝茶和屯溪茶8000担。^[9]1784年在广州行商潘启官、石鲸官、周官、钊官、鹏官等手中采购松萝茶、屯溪茶11000担。^[10]1787年贸易季,从广州运出的松萝茶和屯溪茶多达40000担。^[11]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民众的茶叶消费从红茶为主向绿茶为主转变。美国消费者的口味逐渐丰富化,从一味依赖武夷红茶转向饮用口感更加丰富的小种、白毫、熙春、松萝、雨前、珠茶等。^[12]徽州的松萝、屯溪绿茶通过广州十三行出口美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饮茶习俗日趋普及,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对华茶叶贸易需求日益增长,华茶采购量不断加大,有力地刺激了华商不断将茶叶运往广州出口。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说:“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13]徽商将本地所产松萝、屯溪等绿茶大量运往广州出售,从事“广庄”生意的徽商日益增多。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出自著名的茶商家族,自清中叶以来,该家族四五代人持续在广州经营茶叶贸易。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生于乾隆十年(1745),卒于嘉庆十年(1805),其在乾隆中叶以后“贷资经商,独偿众数千”,^[14]开启其家族在广州的茶叶外销贸易事业。^[15]万榜之子世鸾(1772—1839)

继承父业，“关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16]为便于经商和子弟在侨寓地读书仕进，嘉庆二十五年(1820)，世鸾在广东南海县申请入籍成功。世鸾子兴洪(1823—1903)继续在广州从事茶叶贸易。当时詹氏家族共有12个房派，其中长、二房留在家乡，第七房分迁粤东阳江，其余九房在粤东省城居住，多从事茶叶贸易。^[17]

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在乾隆以后，大量前往江西、广州从事茶叶贸易。胡植奎父亲在广州经营茶叶贸易，娶东粤女卢氏，生植奎。植奎“年十二，习会计，于豫章出入”，其后继承父业，继续从事茶叶贸易，“由是经商东粤，时往来存问”。^[18]嘉庆、道光之际，胡承合(1794—1845)，“谋生理于江右，持筹握算，积余资业茶东粤”，^[19]“以茶业益大其家，自是新堂宇，拓田园，入资为国子生，复由国子生转贡生”。^[20]胡高端(1744—1802)，以经营茶行为生。高端子大榜(1781—1820)，“承袭祖业，业茶为生”；大榜长子仕德(1803—1850)，“自父弃世，箕裘克绍，家业光前，商茶往来粤东十有余载”。^[21]祖孙三代持续在广州进行茶叶贸易。

歙县茶商是徽州茶商中的一支劲旅。嘉庆前期，歙县人江绍莲云：“北擅茶笋之美，近山之民多业茶，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歙之巨商，业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賒。其茶统名松萝。而松萝实乃休山，匪隶歙境，且地面不过十余里，岁产不多，难供商贩。今所谓松罗，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较之松罗，无所轩轻，故外郡茶客胥贩之于歙，而休山转无过问者矣。”^[22]可见，歙县茶商在北京、广东等地的茶叶贸易颇为兴盛，贩运松萝茶的利润也较为丰厚。

道光十七年(1837)，英国怡和洋行商人查顿与广州十三行行商安昌行签订购茶、存茶合同，“恒义二五箱屯茶二百一十件”。^[23]道光十八年(1838)，英国怡和洋行从徽商溥馨茶号采购茶叶，双方约定：“和平茶一千六百篓，约共八百担，言明每担(无餉)价银四两五钱正，限至七月尾陆续交足，即收到定银一千五百元，其余俟货交到之日，一色找楚，不得至误”。^[24]同年，英国商人查顿在行商仁和行那里购买“和顺长箱屯茶二百七十件、锦美斗箱屯茶九十八件”。^[25]这些都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徽商将屯溪绿茶运至广州，通过行商转售给洋商的贸易不断发展。

虽然当时包括徽茶在内的华茶出口欧美兴盛一时，徽州茶商由此发财致富者甚多。从19世纪初开始，广州十三行行商的资金日益短缺，周转不灵，纷纷向洋商借贷，由此陷入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影响了茶叶出口贸易。^[26]徽商多将茶叶贩运给行商，通过行商转售给洋商，因而行商的商业困境直接影响了徽商茶叶贸易。其中又以婺源瀛馨号茶商和徽商刘德章创办的东生行盛衰轨迹尤为典型。

嘉庆年间，婺源瀛馨茶号洪氏茶商在广州从事茶叶贸易达数十年，“父亲提办全泰字号来广，二十余年；又接手经营，于今五十一年”，经营松萝茶和瀛馨、馨馨、庆馨、馥馨、惟馨各字号熙春茶，“除纳息之外，年年颇沾微利”。但在嘉庆十四年(1809)以后，该茶号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亏损。嘉庆十六年以后，该商每年收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订单银，采办三四千件松萝茶。但因资金有限，多借款办茶，结果“年年挖利，互相滚赔，共计约亏去三万。再加二十二、三两年，屯茶又赔蚀一万余两之多”。因亏损过大，洪氏茶商十分沮丧，“如此亏空重大，毫无花费分文，自知年已七旬，命途多蹇，欠债又深。计欠广东银一万九千两，江西及南雄、韶州等处一万一千余两，休宁七千七百余两，婺源家乡五千五百余两。谅难借本经营，筹划无法，只得盘算不得已歇业倒帐”。嘉庆二十三年(1818)亏损最多。当年该商号“接办屯茶三千件(连同乎五百在内)，连正、皮茶共过本四万二千零，内蒙付定单银一万五千，另借本二万七千零，净赔本利九千二百余两”。^[27]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求助无果，该商号茶商不久之后倒闭歇业。^[28]

19世纪开始，广州贸易行商提供的出口茶叶多集中在福建的武夷、工夫和屯溪茶等种类，“行商

经常拒绝包括其他任何种类”。^[29]当时经营屯溪茶的为怡和行、丽权行、广利行和东生行四大行商，四家占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采购屯溪茶贸易额的一半以上。这些行商大多从徽商手中采购屯溪茶，其中东生行由徽商刘德章开设，1828年采购的屯溪茶达到顶峰的10000箱。^[30]彼年东生行的行商刘东给英商的信中说：“承问徽茶一节，今五月初四日，徽州洪水涨发，茶叶被冲，尚属有限，谅不至有碍。昨彝山客人来信，据云今岁头二春茶价，比旧岁贵一两有零。其茶因雨水太多，茶身未免稍粗。三春丰熟，比前价略松一两。”^[31]可见，当年因雨水过多，东生行的徽茶和武夷茶生意受到一定影响。仅仅两年以后，即道光十年（1830），徽商开设的东生行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向两广总督呈文，要求地方官府帮助追讨东生行商欠。^[32]两广总督李某发文指出，“东生行既系该职员先人遗业，前曾在行帮办理。今被夷人指控私携银两归家，责无旁贷，应即帮同刘东实力清理，并将各夷账银两上紧，设法措还，不得藉词诿卸”，要求东生行偿还债务。但因欠款多达数十万，东生行无力偿还，最终倒闭。^[33]十月初八日，南海知县发布告示，查封东生行的行栈、房屋产业，“交众商变卖，先完饷项，次及夷欠”。剩下债务则由“众洋商在洋行公用银两，分限摊还”。^[34]东生行的盛衰可谓当时徽商茶叶贸易兴衰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广州贸易繁荣背后暗含巨大的商业风险。

婺源商人程广富，早年在苏州经商，随后将苏州生意交给二弟、三弟打理，他则回婺源，“就近业茶，渐致赢余”，^[35]从事茶叶生意，并由此起家。婺源茶商王邦达，在澳门从事茶叶贸易长达46年之久，在道光二十四年（1846）与荷兰领事进行茶叶贸易，当时“包种茶五百六十件，小种茶八百件，即将船主收茶单转交大班”，后因钱款问题产生纠纷。^[36]由此可见，五口通商之前，徽商不仅在广州从事茶叶贸易，而且还在澳门进行茶叶贸易。

二、短暂繁荣：五口通商初期的徽州茶商贸易

五口通商打破了广州贸易体制局限，西方国家扩大了对华贸易范围，极大地刺激了华茶出口贸易。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开埠，洋商可以深入内地进行茶叶贸易，促使华茶出口贸易迅猛增长而一度兴盛。徽茶作为华茶中品质最优者之一，两次鸦片战争极大地促进徽茶外销，徽州茶商力量日趋壮大。1848年11月4日，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乔装打扮，深入徽州绿茶区考察。他描述屯溪当地茶叶贸易的景象：“屯溪据估有15万人，最大宗的贸易物品就是绿茶。这儿有很多大的茶叶商，他们从茶农或和尚手中购买茶叶，然后进行加工与分类，把茶叶分成不同的批次，运往上海或广州，在那儿再卖给外国商人。据说每年屯溪要运出七八百批次的茶叶。”^[37]对此，夏燮在《中西纪事》中指出：“徽商岁至粤东，以茶商致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开，则六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户户当垆，赢者既操三倍之贾，绌者亦集众腋之裘。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38]明确说明五口通商以后，徽商贩茶到广东贸易更为兴盛的景象，以茶发家致富的比比皆是。

晚清时期，绩溪茶商颇为兴盛，活跃于各大通商口岸。对此，近代学人胡祥木曾说：“吾乡人多操茶业，侨上海，道咸间称最盛。近则惟汪裕泰、程裕和二肆魁，其曹偶余者皆自郅以下焉。”汪裕泰茶号就是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其创始人汪立政（1827—1895），13岁时到上海当学徒，积累一定资本，于道光三十年（1850）在沪南创设汪裕泰茶庄，“所业隆隆日上，闻誉交驰，前后三十年间相继于上海、苏州、奉贤等处创列九肆”。^[39]由此可见，汪立政抓住五口通商之后茶叶外销的有利时机，创办汪裕泰茶庄并迅速获得发展。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此前在广州经营茶叶贸易，五口通商之后，茶叶外销日盛，江氏茶商同时在广州、上海经营外销茶，获利颇丰。

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出身于茶商家族，其家族的茶叶贸易历程在徽州茶商家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胡适父亲胡传(1841—1895)在自传年谱中说:“余家世以贩茶为业,先曾祖(瑞杰)考创开万和字号茶铺于江苏川沙厅城内,身自经理,借以资生。”由此开启该家族的茶叶生意并传承数代。胡适曾祖胡锡镛子承父业,继续在上海川沙地区经营茶叶贸易。胡瑞杰、胡锡镛的茶叶经营时间集中于乾隆末年至道光中叶。胡适祖父胡奎熙、父亲胡传两代人的茶叶贸易应系鸦片战争前后至19世纪60年代。因胡锡镛去世较早,胡奎熙成年后就接手茶叶生意并使其日益兴隆,“每岁之春必归里采办各山春茶”。^[40]道光二十三年(1843),胡奎熙在上海开设茂春茶号。咸丰三年(1853),上海受到小刀会起义影响,胡奎熙在宝山高桥镇避乱,并重新开设茂春茶号。起义被镇压后,胡奎熙在上海大东门外重开茂春字号茶铺。咸丰七年(1857),他又在大东门内鱼行桥头添设茂春西号茶铺;咸丰八年(1858)在川沙北街开设嘉茂字号茶铺,每年皆获利颇丰。^[41]胡奎熙不仅贩运徽茶,而且还在皖南宁国等地采办茶叶,运到上海出售。咸丰九年(1859),胡传跟随父亲到宁国山中采办山茶。^[42]胡适父祖辈抓住五口通商之后西方国家大量购买华茶的有利商机,数代成员业茶于沪上,集中体现了徽商敏锐的商业眼光与坚韧的从商精神。

道光二十五年(1845),歙县茶商毕体仁的叔祖毕钜典接手家族的茶叶生意,将“傍余基地兴造包厢楼屋,以便加锅添做洋庄箱茶,而本行用息较前益加倍进。通盘划算,似属合宜”,转而经营洋庄茶生意。为此,毕钜典扩大行屋规模,添设制茶设备,“核计通直,五间包厢楼屋并添茶锅一切经费约需钱陆百余千文之谱,家下资斧不足,比蒙张号允借钱三百千文,议定一分一厘行息立券,将下年应得用息钱按月偿利,陆续拨本,至道光二十九年已将借张号款本息完清。”由此可见,毕氏茶商不仅扩大了茶叶经营规模,偿还了债务,而且还获得一些利润。咸丰二年(1852),毕氏茶行进一步升级,将茶行前进屋宇拆除改造,扩大门面,增加晒场,花费不少,“需费一切,计用去钱四百余千文”。^[43]毕氏茶商两次扩大茶叶经营规模显然与五口通商之后带来的巨大商机有关。

道光末年,祁门茶商胡元龙协助父亲胡上祥开山种茶,“入山雇工种茶料、茶子,以为养老计”。在咸丰二三年之时,获得五六百两的收入,从而在贵溪村“半山建造培桂山房”,开设日顺茶号,扩大经营规模。^[44]婺源茶商在五口通商之后也获得新的发展,不仅继续在广州贸易,而且也在上海经营茶叶外销生意,实力较为雄厚。例如,俞文诰“佐父业茶于粤东,积资百万”;俞起鸾“承父茶业,客粤东,粤俗繁华,不为所染”。^[45]台湾学者陈慈玉也说:“徽州商人的茶业活动主要是由婺源商人所担当的,而在所有徽商活动之中,茶业比重之增大,与徽商之中婺源商人的地位之提升有关联。”^[46]

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五口通商仍旧无法满足西方国家对华茶的巨大需求,为追逐商业利益,西方商人冒险深入尚未开埠的内地茶区采购茶叶。咸丰十年(1860)冬,英国怡和洋行商人颠地进入江西,先经过河口,然后到达景德镇,随后赴屯溪、婺源一带收购茶叶。^[47]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九江关监督称,怡和洋行原本打算到义宁州采办红茶,但因当地附近有太平军活动,改到南昌府吴城镇租棧收买茶叶。同时,英国宝顺洋行与美国琼记、旗昌洋行没有任何凭照,但却陆续前赴吴城镇办茶。不仅如此,“洋商自在九江向内地商人买茶者,又有商人采办徽茶,由饶州来至九江者”。^[48]英美商人在长江内河开埠前深入内地茶区采办徽茶,显系违反条约规定的不法行为。

所谓“有商人采办徽茶”者,系指祁门红茶创始人之一的黟县茶商余干臣。关于其人来祁门从事茶叶贸易尤其是改制红茶的时间,学界普遍认为是在光绪初年。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新见的总理衙门档案来看,早在咸同之际,余干臣就到祁门从事茶叶贸易,而且当时他还假冒洋商之名,行私茶贸易之实,逃避厘捐,并由此引发中外贸易纷争,系以典型的奸商形象呈现世人。

祁门知县史恂悠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后,随即开始盘查祁门当地茶叶贸易情况,并向上

司禀报：

该县出产茶叶，向系由商人采买，挑至屯溪装箱成引，完纳厘捐，运至上海销售。本年浙河不通，商人私由祁门西南乡，运至江西九江售卖，本地应完厘捐，两次皆已偷漏。该令八月十三日到任后，使得查悉，因点明未出境之茶，尚有二十余引，令其照完厘捐，方准起运，并查得该县程村碣地方，有黟商领广客资本，开设宝顺茶号。本年获私茶之利最多，因令捐银五千两，借助餉需等情。^[49]

上揭祁门知县的奏报显示，祁门的茶叶通常由茶商采买，贩运到屯溪装箱，完纳厘捐。但在咸丰十一年，因新安江水运不通，茶商私将茶叶由祁门西南乡经闾江运至江西九江发卖。史知县上任后，查明此事，发现黟县商人领“广客资本”，在南乡程村碣私自“开设宝顺茶号”，进行私茶贸易。因当时正处太平天国战事期间，军饷匮乏，于是祁门知县令其捐银五千两以助军需。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折中称：

据护江西九江道蔡锦青禀称，本年九月十九日，准英国驻札九江领事官佛礼赐照会，内开宝顺洋行在徽州祁门县地方租设栈房，采买茶叶。今有祁门县知县史恂悠，突于八月二十四日，带回差役，到栈假托稽查，平空讹索，捏称漏税，即将栈中茶叶尽行封住，随将司事人余干臣等，趋押而去，逼勒捐输银一万两。因查厘金一款，随处完捐，均是报效。本年茶叶运赴九江码头，所有捐厘一事，由景德镇每担捐银一两四钱，尧山每担捐银二钱，湖口每篓六十五斤，捐银二钱。该行厘遇卡即完，并无偷漏情弊。至在栈之茶，尚未出门，不得谓其漏税而封，且和约规条具在，所有内地出口各货抽厘，俱照出口关税减半。茶叶出口，例税每百斤纳银二两五钱，遵照税则，减半完厘计算，已有盈无绌。该县何得又平空勒索，妄加例外之捐，实属不晓事务，有碍通商章程。用特照会，请烦查照，希即转移皖南道速飭该县，将讹索英商宝顺洋行银货，尅日发还。倘有疏虞，决不干休，毋任阻扰，致干和好等因到道，准此卑护。^[50]

在上引曾国藩的奏折中，当年八月二十四日，祁门县知县史恂悠以偷漏税的名义，将所谓在祁门开设栈房的“宝顺洋行”的茶叶及司事余干臣押解，并要求其捐输银一万两。英国驻九江领事官佛礼赐获悉此事，立即向九江道员蔡锦青提出强烈抗议，称宝顺洋行“厘遇卡即完，并无偷漏情弊”，且其贸易是符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签订的“和约规条”的，因此，祁门知县的这种行为是“平空勒索，妄加例外之捐，实属不晓事务，有碍通商章程”。不仅如此，英国领事官还以照会的名义发文，要求清廷查办此事，将“讹索英商宝顺洋行银货，尅日发还”，态度十分强硬。

九江道员收到英国领事官的照会后，觉得事情十分棘手，立即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报：

道查祁门县系安徽省所辖，该县知县史令查封宝顺洋行茶叶，系因何事而起，无从知悉，有无逼勒捐输情事，亦系该洋商一面之词，既准照会到道，理合据实禀明，俯赐札飭祁门县史令，查覆飭知到道，以便转复佛领事，遵照等情。^[51]

收到九江道员的奏报后，曾国藩立即向总理衙门奏报此事。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拉开了调查中外贸易纷争的序幕。

清代从事茶叶贸易需要在牙行领取牙贴，获取经营资格，在相应部门领取茶引后才能进行茶叶贩运。若没有履行上述手续，则是私茶贸易，需要受到惩处。鸦片战争后，西方经济势力不断渗透中国各地，按照条约规定，洋商在内地采办茶叶、租设行栈，也需要由该国领事与地方官进行商谈，进行备案并获得许可后，洋商才能到内地租设行栈、贩运茶叶。若洋商没有履行这些手续，则地方政府不准洋商“租地造房”，目的是“以杜内地奸商假冒影射之弊”。而咸丰十一年，在祁门程村碣地方私自开

设的宝顺茶号并没有“洋商设栈明文”，被祁门知县以贩运私茶之名查办。知县旋即要求黟县茶商余干臣输捐，他就声称该号为“洋商开设”，曾国藩怀疑“恐系内地商人串通冒认”，要求皖南道员负责查办此事：

如所捐系黟商之银，不与洋商相干，应无庸议。若所捐果系洋商之银，再行酌核退还，仍候分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总理各口通商事务，与各国明定章程。此后洋商在内地设栈置货，必须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商，先行呈报，以杜弊端，而敦和好。仰即转复佛领事知照，仍候抚部院批示，并录报查缴印发，并分飭署皖南道姚道体备，署祁门县史令恁悠外，相应咨明。

此后，总理衙门、两江总督、江西巡抚、祁门县、英国领事馆等中外衙门之间围绕这场茶叶贸易争端反复调查、讨论。

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衙门给英国发出照会称：

现准两江总督曾咨称，内地奸商设立行栈，往往假冒洋商为名，诸多弊端，请与各国明定章程。此后洋商在内地设栈置货，必须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商，先行呈报，以杜内地商人串通冒认等情，前来相应照会，贵大臣通飭各处领事官，晓谕各商人。嗣后，如有洋商在内地设栈置货，必先报明领事官，由领事官转报海关监督，交地方官存案，以便稽查。中国定必按照条约办理，倘不先期呈报，无论华商、洋商，所有一切捐输、抽厘，均照内地章程办理，庶几内地奸商不致假冒洋商为名，从中作弊，请烦贵大臣查照施行。^[52]

从这份照会中可知，经过一番调查，清廷认为内地奸商多假冒洋商的名义进行茶叶贸易，要求洋商今后在内地设栈办货需要走官方程序，由该国领事官转报海关监督，交地方官备案。

收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后，英国领事馆颇为不满，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总理衙门发出照会声称：

来文内开两江总督曾咨称：内地奸商假借外国商名，开立行栈，期免抽厘等项一节。此事曾大人所指何处而言，本大臣实难分晓。若论内地城镇，则约内本无外商进内开行之条。若论各口，则地方官宜将某行是否洋商所立，向该国领事官一询便知。本大臣之见，此等情弊，原无英商在内，合俟曾大人详加确查转咨，以便查办。^[53]

在这份照会中，英方不仅要求清廷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内地奸商假冒洋商名义开设行栈的事情，并就行栈是否为洋商所开，向该国领事官询查。同时，英方对曾国藩提出的“内地奸商假借外国商名，开立行栈，期免抽厘”的指控加以否认。

收到英国照会后，总理衙门在给英国回复的照会中称：

查英国条约第九款载：英国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并无准在内地赁房设栈之语。第十二款载：英国国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等语。所谓各口者，如上海之吴淞海口也。所谓各地方，系指附近海口，或府或县之地方而言，如上海县之城外是也。条约只有各地方三字，并无内地字样。今祁门县程村碛在徽州府境，系属内地，非洋商应设栈房之所，英领事言宝顺洋行，在祁门租设栈房，实与条约不合。至茶叶出口税，每百斤纳银二两五钱，如洋商自赴内地置买，应纳内地关税，但须在所经第一子口，呈单报验货数，请领运照，沿路验放。至最后子口报完内地半税，茶叶百斤纳银一两二钱五分。洋商锱铢必较，岂肯遇卡捐厘，至一两九钱余之多。诚如曾大臣来咨，恐系华商串通洋商冒认，怙恣领事出头争论。此案应由曾大臣侦查明确，酌量核办。惟外国商人止准赴内地游历、通商，不得在内地赁房设栈，似应申明条约，立定章程，拟请贵总理衙门照会英、法公使，通行各口领事，转飭洋商，一律遵照，并拟请俟接据英法照覆后，再给美国公使蒲姓照会一分，发交本署大臣转递，令其一体通行，各领事转飭遵照。为此，咨呈。^[54]

这份照会重申外国商民有在中国内地通商口岸游历、经商的特权，而不准其在内地即未开通商口岸赁房设栈。按照中英《北京条约》第九款、第十二款规定，外国商民只允许在通商口岸，及各地方游历、经商，并不准在未开通商口岸开设行栈，进行贸易活动。祁门县程村碣为深处内地的徽州府山区，并非已开通商口岸，因此，英国领事官所言洋商开设的宝顺洋行，在祁门开行设栈，与中英双方已签订的条约相背。所以，总理衙门要求照会英法公使，要求洋商一体遵照，并再次重申洋商不得在内地未开通商口岸开设行栈。

其实，早在咸丰十一年六月，英国商人就违反条约，私自在江西南昌府吴城镇开设栈房，他们“或停泊河干，或游行镇市，或住宿洋栈”。当时的江西巡抚毓科对此感到忧虑，要求凡在吴城镇的洋商，必须随时通报，并查验其是否有护照文凭。^[55]

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四日，总理衙门在给江西巡抚沈葆楨的下行文书中称：“惟吴城镇地方，并非通商口岸，应不准其设立行栈。本衙门前因两江总督咨称，有安徽黟商在祁门县设立行栈，而英国领事乃出为承认，称系洋商开设一案。经本衙门照会英国公使，旋据照覆内称，内地城镇，约内本无外商进内开行之条。此等情弊，原无英商在内等语。”^[56]在此，总理衙门将洋商在吴城镇开设行栈的行为，与此前黟县茶商余干臣假冒洋商之名，在祁门县程村碣地方开设行栈的事情相提并论，其目的则是为强调洋商此种行为均是违法的。

经过中英双方多次来回商讨之后，同治元年二月初五日，总理衙门就咸丰十一年双方因在祁门县境内发生的宝顺茶号贸易争端一事，向英国政府发出照会。将其文字抄录如下：

二月初五日，本衙门发英国照会，前准两江总督曾咨称，内地奸商设立行栈，往往假冒洋商为名，经本爵于上年十一月十二日，照会贵大臣，设法分别，以免奸商假冒。旋准贵大臣照覆内称，内地城镇，则约内本无外商进内开设行栈之条。若论各口则地方官易将某行是否洋商所立，向该国领事官一询便知等情弊，原无英商在内，合俟曾大人详加确查转咨，以便查办等因前来。本爵当即行文两江总督，令其查办。嗣据覆称，徽州祁门县程村碣地方，有黟商开设茶行，偷漏厘捐。经地方罚令捐银五千两，而贵国领事官佛照会九江道则称：该茶行系宝顺洋商开设，该县妄加格外之捐，请将银货发回等语。

本爵查祁门地方，距长江口岸甚遥，系属内地，并非外国商人应设行栈之处。该领事索还捐银，自系受内地奸商蒙蔽。为此，照会贵大臣，即烦转饬佛领事，查照条约，及贵大臣前次照覆所称各等语办理，勿为内地奸商所蔽，庶不致与条约相背。又现据江西巡抚文称：去年六月后，有洋商在吴城镇开设栈房等语。查吴城镇系南昌所属，亦系内地城镇，并非通商口岸。洋商不应在彼开设行栈，相应一并照会贵大臣，转饬驻扎，九江领事官，查明吴城镇是否有洋商开设行栈。如有国有此事，亦应查照条约，及贵大臣前次照覆所称各等语，晓谕该洋商等，勿得在吴城镇开设行栈，并希饬令各口领事官，晓谕各口商人，均不得在内地城镇有开设行栈之事，以符条约。惟此事系去年六月以后之事，至今始行，查明呈报，该地方官实属不明条约，疏于查察，除将该地方官议处外，所有该该处领事官，及洋商人等，亦应由贵大臣饬办。俾得两相遵守，以免紊乱条约。是为至要。

从这份照会文字可以看出，咸丰十一年所谓的中英双方的贸易争端是因黟县茶商假冒洋商名义，在祁门地方开设宝顺茶号，中外商人相互串通，偷漏厘捐，从而引起中英两国贸易争端。

因此，早在咸同之交而非光绪初年，黟县茶商余干臣就曾与英商串通，假冒洋商名义来祁门县开设行栈，进行不正当的茶叶贸易。同时，此前学界对余干臣商业贸易多是正面评价，强调其创制祁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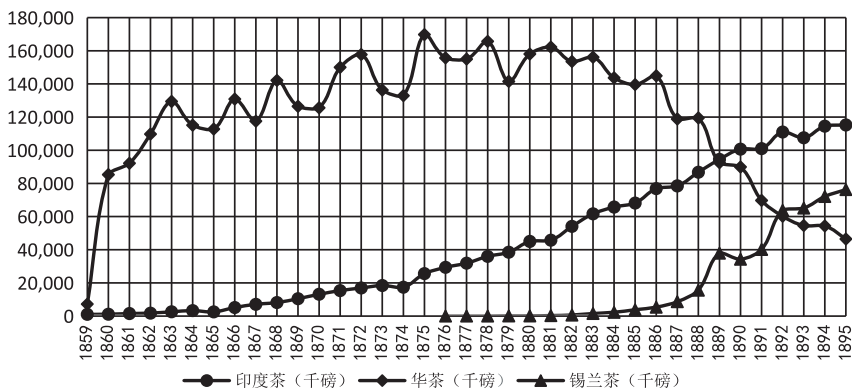
红茶所带来的变革意义。但从档案资料来看,余干臣唯利是图,为牟取暴利而不惜与洋商串通,其负面商业形象跃然纸上。卞利教授曾撰文指出,徽商在徽州本土和域外呈现出正负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57]而祁门红茶早期创始人之一的余干臣则为徽商的负面形象提供了绝佳注脚。这些都说明,在长江内河正式开埠前,因经营外销茶有很大利润,中西商人在茶叶经营上互相勾结,同时也折射出徽州茶商善于把握世界市场茶叶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三、挑战与机遇:国内外局势变动与徽州茶商的复兴

19世纪中叶,国内外复杂局势给华茶和徽商带来巨大的商业挑战。就国内来说,咸同兵燹使江南地区和徽州本土都惨遭战火洗劫,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商业活动无以维系,徽商资本多被劫掠,茶叶经营被迫中断。从国际方面来看,中国茶叶出口日益遭到印度、锡兰等英属殖民地所产红茶和日本绿茶的强烈冲击,在欧美市场的份额逐渐被外国茶叶挤占。同时,伴随着国际茶叶贸易重心整体由绿茶向红茶转变,国际上红茶贸易迅猛发展,客观上推动红茶制造技术在国内不断传播,红茶产区由此日益扩大,给徽商的茶叶经营带来新的机遇。为顺应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的发展变化,徽州茶商迎难而上,追求创新,创制出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茶叶品牌,在时代赋予的挑战与机遇的夹缝中走向复兴。晚清以后,徽商在食盐、典当、木材等传统行业经营中逐渐衰败,徽州茶商由此成为引领近代徽商群体发展变迁的核心力量。

(一)挑战:海外茶叶的竞争与咸同兵燹的冲击

19世纪中叶以后,华茶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受到印度和锡兰红茶的冲击。笔者对1859至1895年英国进口茶叶数量进行统计,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1859—1886年印度茶叶数据来自 *Tea*, 1888, pp. 116—117; 1887—1895年印度茶叶数据来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9、243页。华茶数据来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第238—239、243页。锡兰茶叶数据来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1页。

图1 英国进口印度茶、华茶、锡兰茶数量对比图(1859—1895)

从图1可以看出,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进口的华茶(主要是红茶)、印度茶和锡兰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具体来说,1863年以后,华茶出口英国数量出现波动性上升,到1874年出现第一个低谷,1875年达到历史最高峰,此后开始呈现波动性下降。与此相比,印度茶出口英国数量从1859年开始逐渐上升,1875年以后整体上升幅度进一步增大。到1889年,英国进口的印度茶数量开始超越华茶且继续保持原有上升幅度,在国际市场上对华茶造成严重冲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英国不仅扶持印度茶叶,而且也积极扶持锡兰茶叶发展。自1876年开

始,锡兰茶叶在英国茶叶市场销售量不断增长,1888年以后整体开始大幅度上升,已对华茶构成实质性威胁。民国初年,茶学家程天绶指出:“锡兰植茶,始于光绪二年,其历史最短,而其进步则最速。……故锡兰虽为后起之秀,然其制茶之精良,颇邀时誉,产额以红茶为大宗,绿茶则颇少,畅销于各国之范围颇广。”^[58]锡兰茶叶发展之快,对华茶冲击之严重可见一斑。

从上述分析可知,1875年对于华茶出口英国贸易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即由此前的整体上升趋势转入整体下降趋势,并逐渐受到印度茶、锡兰茶的不断冲击。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以红茶贸易为主的国际茶叶贸易新格局,在挑战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

十分不幸的是,当印度、锡兰红茶冲击中国红茶国际贸易市场的同时,日本绿茶也在不断冲击中国绿茶在美国的市场,造成中国绿茶出口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滞销的困境。笔者对1859—1882年美国进口中国和日本绿茶情况作了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美国进口中国绿茶、日本绿茶数量统计表(1859—1882) 单位:磅

年份	日本绿茶	中国绿茶	年份	日本绿茶	中国绿茶
1859—1860	365,300	17,859,100	1871—1872	15,842,119	20,226,731
1860—1861	251,100	8,687,400	1872—1873	17,271,617	22,234,339
1861—1862	322,100	12,565,200	1873—1874	18,459,751	19,846,729
1862—1863	977,200	8,473,200	1874—1875	21,969,308	19,218,652
1863—1864	2,412,800	12,094,000	1875—1876	26,282,956	17,076,417
1864—1865	1,214,100	7,058,600	1876—1877	23,218,491	14,937,560
1865—1866	759,230	12,774,200	1877—1878	22,558,088	15,623,372
1866—1867	6,054,300	14,896,800	1878—1879	25,350,710	12,987,573
1867—1868	7,102,700	13,482,000	1879—1880	34,758,172	15,333,000
1868—1869	10,296,700	18,834,500	1880—1881	39,778,129	19,339,196
1869—1870	10,852,520	18,771,700	1881—1882	35,137,933	20,708,746
1870—1871	12,384,100	17,898,400			

资料来源:1882年纽约领事高桥新吉氏的报告《通商汇编》,转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

从表1可以看出,1859—1882年,美国进口中国和日本绿茶数量整体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国绿茶在美国市场日益遭受日本绿茶的冲击。具体来说,1860年开始,美国进口的日本绿茶整体不断增长,在1863—1864年突破200万磅,在1868年已突破1000万磅,开始对中国绿茶在美国市场构成实质性威胁。尤其在1874—1875年,美国进口的日本绿茶数量接近2200万磅,首次超过中国绿茶的进口数量,并于此后在美国占有份额的增长速度更快,取得压倒性优势。换言之,1875年左右对于华茶出口美国贸易也是一个分水岭,中国绿茶在美国市场的优势逐渐被日本绿茶挤占,已成江河日下之势。

综上所述,18世纪末以来逐渐形成以红茶为主的国际茶叶贸易新格局在19世纪以后不断得到增强。尤其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华茶在国际市场中不断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茶叶的冲击,华茶出口贸易日趋衰落。

19世纪中期的咸同兵燹使徽州本土、江南、闽粤地区都遭受战火打击,徽州茶商的茶叶贸易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咸同年间婺源惨遭战火洗劫,婺源茶商受到重大打击。胡起彬(1833—1876)，“时父以下,不下十数人,东西趋避,用度日繁,倍形困惫”,为解决家庭生计问题,遂与人合伙从事粮食贸易,逐渐起家。

他虽身处乱世,但志向高远,有感“近世起家多从茶业,因业茶,不期茶大失利,旋贩木于浙之灵湖,以图恢复”,但“淹滞数年,资斧尽丧,素手归来,才经两载,抑郁成疾,赍志以终”。^[59]胡华鏞(1824—1880)活跃于咸同年间的商场,其祖上三代经营粮食贸易。到华鏞时,他除继续粮食生意外,还与人合伙从事茶叶贸易。但在咸同兵燹期间,“起家半由茶业,因失利,遂绝志,或聘同事固,固辞。旧岁,茶遭大厄,而亏利亏本者,靡不垂头丧气”。^[60]婺源胡旺中(1825—1901)于咸同年间“业茶业木,并顾兼营。久之,茶既失败,木又亏损,始萧然,无复有湖海志”,^[61]战乱造成其茶叶、木材生意亏损严重,遂从商海退隐。

前述胡适祖父胡奎熙的茶叶贸易虽然在五口通商之后一度兴盛,但当战火波及徽州和上海之后,其茶叶生意受到重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占川沙、宝山,胡奎熙和胡传在两地经营的两处茂春茶号被毁。同治元年,上海到绩溪的路途被战乱阻断,胡氏家族“家中前年所购茶百数篓,被贼掠去,其赀本及屡次避乱迁徙之费,共计二千八百金”,^[62]茶叶经营无法维系,胡传家人被迫开始逃难生活。

当然,咸同兵燹并未造成所有徽商生意都万劫不复,在此期间发家致富者也偶有人在。婺源茶商胡宏楷壮年“叠业茶务,获白金。由是构新居,置田产,纳粟,贡成均”。^[63]但在战乱中能发家致富的仅是少数,绝大多数茶商都陷入困境。

(二) 机遇: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的新转向与徽州茶商的复兴

面对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徽州茶商积极寻求新发展。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根据清廷政策,及时转换茶叶贸易口岸,将茶叶贸易从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二是迎合国内外市场需要,结合徽州本土茶叶的资源优势,注重制茶技术的革新,创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茶叶品牌,极大满足国内外茶叶市场需求,使徽州茶叶与茶商发展迎来新的契机,推动茶商成为近代徽商的核心力量。

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陈慈玉就注意到19世纪前期国际茶叶贸易格局中红茶取得压倒性地位的新转向,并认为其限制了徽州茶商的发展。^[64]笔者认为,这一转向促使徽州茶商审时度势,创制新的茶叶品牌,为自身发展赢得新的契机。

黄山毛峰始创人为歙县茶商谢正安。咸同兵燹期间,谢氏家族备受战乱打击,家业被毁,谢正安和弟谢正富跟着父母逃避战火,东躲西藏。同治初年以后,动乱逐渐平息,谢正安开始经营茶叶生意,逐渐积累财富。他利用黄山周围优越的茶叶资源,于光绪元年前后创制黄山毛峰,开设裕大茶行,将茶叶贩运到上海、东北等地销售。关于谢氏茶叶生意的兴起发展,谢正安长子谢大均在民国九年(1920)的闾书中说,“溯自幼年习易于潜口,恪守店规,及壮经理茶务于本里。数十年来,先父创于外,余襄于内。薄置山场田产,兴养开垦,克成实业,一切谨遵遗训,不敢有违”。^[65]其家族茶叶创制发展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谢正安也在皖北运漕新街开设谢永馨店,在柘皋镇北门开设天成茶叶店,两处后又各设分店,可见当时茶叶外销形势大好。宣统元年(1909)的分家书中,谢正安叮嘱“裕大和记号内所制洋庄做茶家俱全堂存公,以备做茶公用”,可见洋庄生意在谢氏家族中的地位。黄山毛峰的经营,在谢大均这一代得到更好的发展,“数十年经商得意,名震欧洲四五载”,^[66]经营黄山毛峰的谢裕大茶行闻名遐迩。

前文已提及,祁门红茶始创人之一的余干臣于咸丰十一年到祁门南乡为英国宝顺洋行收买茶叶,此时正值祁门红茶萌芽于乱世之中,影响有限。当时国际茶叶贸易中以红茶为主,进一步刺激红茶制造技术在国内传播,促进红茶产区不断扩大。祁门红茶制造技术来源有二:一是学习宁红制法,以胡元龙为代表;一是学习闽红制法,以余干臣为代表。民国调查报告也说:“安徽向制青茶,改制红茶实

肇始于建德。当民国纪元前三十七年,即有黟县人余姓在建德尧渡街地方设红茶庄,试制红茶。翌年,即往祁门设子庄,勤导园户酿色遏红诸法,出高价收买红茶(指毛红茶)。第二年,即在祁门西乡闪里开设红茶庄。祁人胡君仰儒,本南乡大园户也,特自制红茶以为之倡,此为徽茶改制红茶之始。”^[67]

胡元龙和父亲胡上祥在咸丰年间开山种茶,逐渐积累资本。光绪元年(1875)前后,胡元龙请江西宁红制茶师舒基立来改制红茶,获得成功,“建设日顺茶号,及承纶堂、居仁堂,种种基业,皆我父子兄弟半生日夜辛勤,备尝艰苦,始得臻此完美。”^[68]黟县环山人余光奎,幼年在建德经营茶叶,随后到江西义宁州学习红茶制法,观察到当地茶质不如祁门之茶,于是建议祁门茶商改制红茶,没能得到采纳。余氏回到黟县立川,请其宗育之出资,光奎代为经营,“后果得外人鉴赏,获利倍蓰”,此后茶商纷纷改制红茶,祁门红茶逐渐闻名于世界,后人评论“开祁茶之利源,始余育之,而献议经办,实公之首功”^[69]。

因国际贸易中红茶十分兴盛,很多徽商纷纷从事红茶贸易。绩溪茶商王维达,12岁到上海程裕和茶号当学徒,但茶号老板墨守成规,仅限于本帮茶生意。王维达建议该茶号将茶叶“推广至山东青岛一带,倾销俄罗斯国”,因“以信实招来,店务日起”^[70]婺源茶商俞嘉法“奔劳湖海,跋险山川,江西、广东之地,宁波上海之区,皆尝托足贸易焉……江西义宁州土产红茶,我婺商畏其途远,不敢问津,翁独囊贖赴宁采办,以为之倡。后之婺商接踵至宁者,咸道翁先开通之力……以茶业积贖不下万金”^[71]歙县茶商吴士彦,“道光季年,海禁大开,益扩充实业,设庄制出口茶以换回利权,业益进,家益兴,置田宅”^[72]黟县茶商孙理和,“开新牌于汉镇,他若茶香馥郁,味亦略尝,酒酿清纯……意切振兴国货,运红茶于海参崴境,志存推广华商”^[73]将茶叶贩运到海参崴,直接参与中俄茶叶贸易。祁门茶商陈丽清在光绪初年经营红茶生意,“怡丰红茶头字,在汉口单价售三十七两五钱”^[74]祁门茶商李训典家族从事安茶、红茶贸易,虽然在光绪五年(1879)“红、安两茶,均遭亏折,继开景隆茶号又蒙钜创”,但随后在李训典的努力下,在光绪十四年(1888)已有了不少盈余,并将之用于建造新房。^[75]晚清时期,祁门境内已是“植茶为大宗,东乡绿茶得利最厚,西乡红茶出产甚丰,皆运售浚、汉、沪港等处”,^[76]茶叶贸易盛极一时。

四、结 语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主导的国际茶叶贸易格局呈现出从绿茶贸易为主向以红茶贸易为主的重大转变。在海外对华茶不断增大的需求下,经营外销茶十分有利可图。在广州贸易体制时期,徽商经营的松萝茶、屯溪茶通过十三行出口欧美国家,茶叶贸易十分兴盛,徽商由此发家者甚多。但行商资金短缺,商欠日多的商业困境也直接影响了徽商茶叶贸易。

两次鸦片战争打破了原有的华茶出口贸易格局,客观上扩大了与西方贸易往来的开放程度,短期内迅速刺激西方对华茶的市场需求,极大地促进徽茶外销。徽商抓住这一新的机遇,不断将徽茶贩运到上海等地出口,迎来新的发展局面。与此同时,包括徽州茶商余干臣在内的中西商人为追逐商业利益,在茶叶经营上互相勾结,也反向折射出徽州茶商快速察觉国际茶叶贸易格局变动的敏锐眼光。但随即而来的国内战乱和周遭国家茶叶产品的激烈竞争,使得华茶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不断减少,在给徽商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机遇。徽州茶商在夹缝中迎难而上,主动迎合国内外市场需求,注重技术革新,创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优质茶叶品牌,努力争取并拓宽世界市场空间。

在国内外经济、政治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清代中后期的徽州茶商贸易经历繁荣——受

挫——复兴的曲折际遇。从广州贸易体制时期到开埠通商时期,除外贸商业中心的变更外,更是充斥着两次鸦片战争及咸同兵燹等战火的冲击。徽州茶商始终前后相续,在历史剧变中勇于创新而走向复兴,成为引领近代徽商群体发展变迁的核心力量,在推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乃至近代社会经济变迁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后对徽州乃至近代中国茶商群体的研究中应更加注重运用全球史视野,从国内、国际市场相互作用的背景出发进行综合考察,如此可望在将来对该群体在近代中外经济互动中的作用与地位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注释:

[1] 吴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述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张燕华、周晓光:《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王国键:《论五口通商后徽州茶商贸易重心转移》,《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周晓光、周语玲:《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周晓光:《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张小坡:《近代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及劳资关系处理》,《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梁仁志:《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等。另外,关于徽州茶商研究综合回顾,可参阅朱传炜、康健:《新世纪以来徽州茶商研究回顾与展望》,《农业考古》2019年第2期。

[2] 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从国际贸易角度关注徽州茶商、茶农研究,如陈国栋:《赣馨茶商的周转困局——乾嘉年间广州贸易与婺源绿茶商》,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1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93-434页;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美]刘仁威:《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黄华青、华腾达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第62-95页。

[3] 刘勇:《中国茶叶与近代欧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62-94页。

[4] [日]角山荣:《茶的世界史:绿茶的文化和红茶的社会》,崔斌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21年,第49页。

[5] [6] 刘勇:《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93、197-207页。

[7]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8-229页。

[8] [12] [美]简·T.梅里特:《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李小霞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第37-38、203页。

[9] [10] [11]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32、113-114、147页。

[13]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14] 道光《婺源县志》卷20之3,《人物九·孝友四》,道光五年刻本,第10页。

[15] 《徽婺源源詹氏支派世家谱》,光绪十年詹天佑手书族谱。

[16] 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十·义行八》,光绪八年刻本,第11页。

[17] 《徽婺源源詹氏支派世家谱》,光绪十年詹天佑手书族谱。

[18] 《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6《艺文·植奎五十序》,民国五年刻本,第101页。

[19] 《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6《艺文·承合妻戴氏八十寿序》,民国五年刻本,第109页。

[20] 《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7《艺文·承合传》,民国五年刻本,第6页。

[21] 《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7《艺文·仕德传》,民国五年刻本,第30页。

[22] [清]江登云始辑、[清]江绍莲续编:《橙阳散志》卷末《备志·歙风俗礼教考》,康健校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9页。

[23] 《道光十七年安昌行为英国商人查顿存储茶叶合同》,英国剑桥大学怡和洋行档案,档号:MSJM/H1/31/01。

[24] 《道光十八年溥馨印章单据》,英国剑桥大学怡和洋行档案,档号:MSJM/H1/32。

[25] 《道光十八年仁和行英国商人查顿购买茶叶合同》,英国剑桥大学怡和洋行档案,档号:MSJM/H1/33。

[26] 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陈国栋校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

[27] 《嘉庆二十五年安徽赣馨字号茶商陈情书及历年赚赔情形清单》,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号:F01048/20/5。

[28] 陈国栋:《赣馨茶商的周转困局——乾嘉年间广州贸易与婺源绿茶商》,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10辑,第393-434页。

[29]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4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256页。

- [30]吕长岭:《清代“一口通商”时期徽州“屯溪茶”外销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出口量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 [31]《道光八年刘东通报外商徽茶行情》,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号:FO1048/28/42。
- [32]《道光十年英国广州商馆大班县票两广总督追讨东生行商欠》,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号:FO1048/30/5。
- [33]吕长岭、冷东:《徽商刘德章家族与清代国际贸易》,周晓光主编:《徽学》第1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68-194页;吕长岭、冷东:《徽商刘德章家族与清代国际贸易(续)》,周晓光主编:《徽学》第1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36-176页。
- [34]《道光十年南海县处理东生行商欠告示》,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号:FO1048/30/28。
- [35]道光《婺源县志》卷二十三之四,《人物十,义行六》,第7页。
- [36]《监生王邦达为与荷兰领事交易银钱纠葛事呈理事官师爷禀》,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684页。
- [37][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8页。
- [38][清]夏燮撰:《中西纪事》卷23《管蠡一得·盐茶裕课》,欧阳跃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75页。
- [39]《余川越国汪氏族谱》卷3《传状上·汪以德公传》,民国五年刻本,第15页。
- [40][41][42][62][清]胡传:《钝夫年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4、452、446、452-453页。
- [43]《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附体避乱实录兼叙平生碎事》,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15-417页。
- [44]《光绪十七年祁门胡上祥立遗嘱章程文》(义字领),抄本;《民国五年胡元龙立分关书》,抄本。
- [45]民国《婺源县志》卷42《人物十一·义行八》,民国十四年刻本,第11页。
- [46][64]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6、224页。
- [47][48][清]夏燮撰:《中西纪事》卷17《长江设关》,欧阳跃峰点校,第291、291-292页。
- [49][50][51]《安徽祁门县英商私行设立茶栈应恐华商假冒抗捐》,档号:01-31-004-01-006,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 [52]《安徽祁门县英商私行设立茶栈应恐华商假冒抗捐》,档号:01-31-004-01-007,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 [53]《内地城镇按约不准洋商开行恐系华商假冒》,档号:01-31-004-01-008,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54]《祁门县属内地按约不准洋商设立行栈恐内地奸商假冒照会英使查明办理》,档号:01-31-004-01-009,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十九日。
- [55]《英人在吴城镇设栈并在义宁州办由》,档号:01-31-004-01-010,同治元年二月初一日。
- [56]《吴城镇洋商设栈应严行禁止由》,档号:01-31-004-01-011,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
- [57]卞利:《论徽州本土和域外对徽商形象认同的差异及其原因》,《学术界》2019年第4期。
- [58]程天经:《印度锡兰茶业概况与华茶之竞争》,《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6号。
- [59]《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7《艺文·起彬行状》,民国五年刻本,第31页。
- [60]《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8《艺文续编·华鏞行述》,民国五年刻本,第51页。
- [61]《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8《艺文续编·泗公房德立行状》,民国五年刻本,第45页。
- [63]《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7《艺文·宏楷传》,民国五年刻本,第9页。
- [65][66]张斌:《关于“黄山毛峰”创始人谢正安家族的两份闾书》,《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 [67]谢恩隆、陆深:《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续)》,《农商公报》1915年14期。
- [68]《民国五年胡元龙立分关书》,抄本。
- [69]《黟县环山余氏宗谱》卷18《懿行传赞·光奎公》,民国六年刻本,第99页。
- [70]《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20《世传六·家传·商人传·王维达》,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第14页。
- [71]《泗水俞氏干同公支谱》卷末《嘉法公传》,民国十一年刻本,第1页。
- [72]《歙县北岸吴氏慎德堂支谱》卷8《士彦公传》,民国十年刻本,第123页。
- [73]民国《黟县四志》卷14《杂志·孙理和先生七旬寿序》,民国十一年刻本,第172页。
- [74]《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3册,第440、440、505页。
- [75]《李训典行状》,抄本。
- [76][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祁门民情之习惯·职业趋重之点》,《官箴书集成》第1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01页。